

# 三十而立：《二十一世紀》的 慶賀感言

邱偉平

最近學術刊物與報刊雜誌的文章討論，常常牽扯到國際間霸權的爭奪，似乎都注意到中國勢將挑戰美國的迹象。這個迹象在一般人的討論是「修昔底德陷阱」(Thucydides' Trap)。修昔底德寫的《伯羅奔尼撒戰爭史》(*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*)中，頭號霸權雅典面臨着二號霸權斯巴達的挑戰而兵戎相見，以至於整個希臘聯盟都捲入這場爭霸的活動。希臘城邦互相攻伐，最終引來了外敵——波斯干預，形成波斯集團與希臘集團的對抗。人類歷史，強者不容臥榻之旁由他人酣睡，強權不能容許挑戰，終將導致戰爭。上個世紀湯恩比(Arnold J. Toynbee)的《歷史研究》(*A Study of History*)指出內在的“proletariat”(無產階級、窮而無告者)與外在的“proletariat”兩類對權威的挑戰者，前者的挑戰是革命，後者即是二強之間的鬥爭。二號新興勢力，威脅與頭號霸權之間的平衡，則頭號霸權居於中心的地位受到邊緣的挑戰。湯恩比的說法比「修昔底德陷阱」涵蓋面更加廣泛，內容的敘述也更加具體。我們用湯恩比的理論來檢驗世界歷史，從兩河流域開始分析。

## 一 歷史上的霸權爭奪戰

兩河流域文明的「中原」是兩河的河谷地區，挑戰者或是兩河內部的某個城邦挑戰最有勢力的霸權，或是東邊的一批騎馬族群的威脅，或是西邊的安納托利亞高原的民族向河谷的民族挑戰，這是一個例子。兩河流域文明擴大到「中東」為其腹地的觀念時，西半邊是地中海邊緣的地區，主要是希臘人建立的城邦，東半邊是波斯人建立的國家。希臘城邦群代表西方，波斯代表東方。兩邊為了爭奪中原，戰爭不斷，最後希臘戰勝了波斯。但是，希臘人沒想到，自己的挑戰者竟是西北邊緣的馬其頓；那時，馬其頓還沒有發展到城

邦，只是一個部落王國。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 (Alexander the Great) 統一了希臘，也兼有東方的波斯帝國。

希臘帝國的挑戰者則是來自隔了半個地中海的羅馬人，位處帝國邊緣的邊緣。羅馬仿造了希臘的城邦制度，壯大後擊敗了希臘帝國。羅馬在剛剛開始建立帝國的時候，羅馬軍團兵鋒四出，向各處征伐。征討的大軍，通常在新佔領土留下，做了獨立總督，安享榮華；也有人選擇回羅馬爭奪領導權。著名的凱撒 (Julius Caesar) 和元老院鬥爭就是一個例子。凱撒帶兵到西北高盧一帶開疆闢土，得勝回朝，志在主宰中央政權。羅馬當權的元老院謀殺了凱撒。凱撒的侄子屋大維 (奧古斯都, Augustus) 反戈一擊，取得政權。這一類外藩挑戰中央的情況，在羅馬歷史上層出不窮。

外敵挑戰的個例，則是位於地中海西南面、非洲北邊的迦太基。這是腓尼基人建立的國家，佔有肥沃的種麥區。腓尼基人早年一向與希臘人在地中海各行其事，希臘人在陸地上行商和攻城略地；腓尼基人長期專注在地中海沿邊、北非一帶貿易。他們在迦太基建立基地，從事麥、鹽貿易致富。羅馬妒忌迦太基的富庶，三代統治者都下決心要消滅迦太基。經過三度苦鬥，羅馬佔領了迦太基，殺戮迦太基人，灌海水毀壞了農田和鹽灘，迦太基在地圖上被抹掉。這一事件，乃是西歐白人政權自居霸主，不容他人酣睡的歷史前例。

羅馬帝國最強盛的時期，羅馬城是空的，軍隊都在外面。羅馬軍隊在各地駐扎，利用當地的勢力，比如，在猶太人國家，猶太人的王和羅馬的總督聯合統治；法律是猶太人的法律，祭司是猶太人的祭司。像這樣附屬於羅馬帝國的國家有很多。羅馬人沒想到，他們的敵人不是出自內部，而是來自帝國邊緣的、地中海以北、歐洲大陸的蠻族。這些來自歐亞通道的各種蠻族，一批又一批，經過幾個世紀的移動和征伐，滲透了羅馬軍隊。這些蠻族終於成為羅馬的新統治者：他們沒文字，沒歷史，沒制度，而被基督教馴化，蠻族的統治階層成為基督教的信徒。基督教教士取得了教權，也取得了統治權。後來羅馬帝國一分為二，西羅馬以羅馬為基地，信仰基督教；東羅馬以希臘為基地，信仰東正教；東正教也是基督教的一部分。兩個教會在同一個基督教名號之下，彼此對抗。

羅馬國土四分五裂，而公而侯，各地的蠻夷爾公爾侯，他們終於將歐洲帶回民族國家的體制。歐洲教廷的普世天下，轉變為俗世的封建國家：一個國家是一個族群，在大文化系統和國家實體的共同體之間，可以有雙層體制套疊。兩個不同國家的王可以是同一族的人，而老百姓可能又是另一族屬。除了教廷的權力，其實也需要一個超越國家的天下機制。這時候，歐洲才有秩序出現。但這個教廷秩序不很穩定，直到法蘭克王國的建立。

查理大帝 (Charles the Great) 是法蘭克王國的建立者，他被教宗授予神聖羅馬皇帝封號。這時，理論上各地民族國家都是他名下的封建屬民。「神聖羅馬帝國」——並不神聖，又不是羅馬，「皇帝」乃是由「選侯」推舉的。東邊的

諸侯有一些代表，西邊的也有一些，從幾大諸侯中選出一人為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。這是一個沒有中心的鬆弛體制，由於缺乏中心，也就沒有邊陲。此時呈現為東西邊互相挑戰的格局。西邊的拉丁語系，中部的日耳曼語系，構成兩個不同語系的國家群之間的競爭。兩邊輪流做東，統治權輪番流轉。西邊霸權是在法國和西班牙之間交替；東邊的在奧地利、德意志等幾個大諸侯中輪轉。那時的民族國家很不穩定，直到近世的《威斯特伐利亞和約》（*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*）的制訂，民族國家才成為各自獨立的主權國家，有各自的軍隊，但文化上都在基督教的羅馬教廷籠罩下。



更東邊有東正教存在。兩個基督教教派相互挑戰一段時間後，東邊的伊斯蘭教興起了。伊斯蘭教在中東地區成為歐洲國家群的挑戰者，相對歐洲，則是邊陲。穆斯林國家的文化水平不低，繼承了波斯傳統，波斯被希臘帝國融合以後，在東方有長久的傳統和龐大的「共同體」。

歐亞大陸，這一個文明世界面積很大，從大西洋一直延伸到今天的阿富汗，一共被分割為三種文化區：西邊是拉丁語系的教會；東邊是基督教國家，而皇室是日耳曼語系；再往東是伊斯蘭教地區。此時的對立是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爭奪。基督教並沒有佔上風，伊斯蘭教繼承了中東久遠的傳統，有豐富的文化內容。兩者長期對抗後，伊斯蘭國家逐漸衰落，停滯不進；中古以來，西方各國在競爭中改善了制度，工商業發展，經濟逐漸蓬勃起來。前述湯恩比所稱「外在的無產者」，身處邊陲，其相對的中央地帶何在？「內在的無產者」為社會貧窮無恆產者，社會的貧富之間，如何區劃？凡此界線，因為歷史是變動的過程，往往難以界定：例如，五胡亂華之初，早期進入中國的族群，本是「外在的無產者」；後期進入中國的族群心目中，那些先到者，竟是「中原」主人了。

在這個大圈子以外，在英國和北歐，有諾曼人和維京人的後代，他們靠海上貿易發展力量。海上貿易是他們的本行，他們與大西洋邊上的西班牙語國家一樣，活躍在大西洋，終於開啟了後來的大航道，由大航道發展出世界性的霸權。他們在歐洲西邊，原本是邊緣，憑藉國際貿易異軍突起。從事國際貿易是合理的，但他們也有靠武力獲取的行為，如強行佔有他人的土地為己有，改變當地的制度，使之成為殖民地。如此「殖民地」制度過去未曾見過，乃是建立在商業掠奪的基礎上的，代替了以陸地封建為主的國家：由西垂變正統，開出一條新路。這條路從西班牙的霸權轉移到荷蘭的霸權，再轉移到英國的霸權：日不落的大英帝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霸權國家。其後經

過兩次世界大戰，美國建立了霸權。美國是英國在北美的附屬地，位處帝國邊緣的邊緣。它在新大陸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，吸引了許多移民，建立了新的傳統，發展出新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。美國的霸權是從大英帝國分支形成，在北美以邊緣挑戰歐洲霸權。

再看東方。中國一向是東亞的領袖，然而這一以「中原」為本部的國家不斷遭逢南北之間的挑戰。隨着秦漢以後匈奴東胡的崛起，北方草原民族中不斷有新起的部落群發展成巨大的遊牧帝國。他們合則鳥聚，分則獸散，分合無定，是在馬背上的征服民族。在草原上，從蒙古高原一直延伸到烏拉爾山脈，也有東西之分。經常出現東方林地的部落進入草原，改變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經濟制度，然後發展成巨大的遊牧帝國。也有從西邊草原興起的突厥，在金山地區利用了當地的鐵與其他豐富的礦物，發展成為強大的國家。草原上，東邊進入高原中央的位置，西邊高原進入中間的位置，無非東西激盪的情況。

自五胡亂華以後，東亞不斷地出現南北之間的動盪，草原上各種族群的鬥爭，最後向長城一帶的中國挑戰，遊牧民族向農耕民族發起挑戰。雖然他們能取得一時的勝利，但無法長期維持。中國的廣土眾民，靠着非常複雜而綿密的道路系統，鏈接中國文化各單元，組織成堅實的集合共同體，不是一群遊牧民族能夠攻破的。

遊牧民族雖然進入中國，但不能長久地統治，也有性質的差異。五胡進入中國北方，建立諸國，君主都自號皇帝兼大單于。草原上的霸權中，突厥的霸權是間段性的，蒙古和滿族的統治是長久的。遼、金、滿仿制中國的制度統治北部，或全部的中國。宋代前後，中亞一帶的突厥、西遼、西夏，在歐亞內陸各處心目中，都是與南宋同稱「桃花石」——那些地方賦予「中國」的另一稱謂。綜合言之，南北的移動，是華夏與草原族群的激盪，以致北方的胡人進入中國；草原上東西的移動，則是霸權的轉移。基本形態都是邊緣國家挑戰霸主，只是，前者往往牽涉華夏文化體的質變；而草原霸主的轉手，對於草原生活形態，影響不多。

兩百多年前，鴉片貿易開始對中國形成一個挑戰。面對西方的船堅炮利、商品的貿易、侵略的商業行為，西風壓倒東風，中國以不同的方式應付了兩百多年，直到今天也尚未走完轉變階段。西歐、北美代表的西方近代文明，與東亞華夏文化的主體，互相激盪，是世界歷史的一件大事；而且，東亞承受西潮，挨打百餘年，此時才有還手應付的能力，更是這一歷史大事過程中重要的階段性變化。

世界性第一次的霸權轉換，過去也有過，但只是局部性的。回教帝國中，蒙古人留下了他們分封的藩王，成吉思汗的子孫在中亞和內亞統治很多汗國。在印度的莫臥兒帝國，是蒙古帖木兒後裔建立的王權。西邊靠近土耳其一帶的土庫曼國，也是蒙古諸汗後裔及其突厥軍人統治的帝國。這兩個舊的帝國跟西方對抗，從某種意義上，也是邊陲與中央的對抗，只是對抗的程度

不是很強烈。莫臥兒和土庫曼接受伊斯蘭文化，與西方的文化距離較近，與東亞較遠。而中國的文化與西方的相差很大的距離。西方宏觀歷史大家，如韋伯、雅斯貝爾斯(Karl Jaspers)、年鑒學派(Annales School)和艾森斯塔特(Shmuel N. Eisenstadt)等，無不指陳：世界各處大文化體系，從源頭言，無不各有特色，而且各有變化的歷史過程。西歐、北美文化，與東亞的華夏文化之間，無論空間距離，抑或神恩、人文的基本差異，也是相距差異最大的。因此，東方與西方的大碰撞，可謂世界面臨全球化天下時，人類必須經歷的重大事件。

真正世界性的霸權挑戰中國，是西方突起的歐美社會，二百年來一直是歐美社會統治世界。期間，中國出現邊疆挑戰中央的情況。日本成功學習了西方，猶如更早的時候俄國學習西方，將東歐地區劃為帝俄的版圖。日本的明治維新，學習了西方的船堅炮利、軍事制度、政治制度等等，全盤輸入西方文化，是西方勢力在東方的代表者。日本以它新興的姿態，挑戰東亞數千年立於不敗的霸主——中國。它於1931年侵略中國(八年的抗戰演變為十四年抗戰)。抗戰以後，中國勉強維持自己的主權，又發生了大革命。西方霸權的代理人日本，替西方在東方建立霸權，一定要花大氣力打敗中國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，都是為了爭奪市場經濟霸主地位。美國從一戰以後，逐漸介入了歐洲的政治。潘興(John J. Pershing)將軍帶領軍隊參加一戰的時候說：我們回來了，回到歐洲了。美國無法從歐洲內部的鬥爭中脫身而出。二戰時，美國以百萬大軍的武裝力量，竭盡全力支持西歐；戰爭結束後，又竭盡全力重建西歐，以對抗新興的挑戰者——俄國；對抗線從大西洋推到中歐。這種挑戰的形式，比湯恩比筆下「內在的無產者」和「外在的無產者」的分野表現得更加清楚。其中有文化的意義，有經濟制度的意義，有在攤牌後軍事衝突的意義。

過去霸權的轉換，我們可以說，是戰場上決定的事情；直到二戰以來，戰場就在你頭頂上：空襲倫敦，在倫敦上空開展空戰。德國後來發明了飛彈，打起了飛彈戰爭，將飛彈直接發射到倫敦。不僅前線戰爭全力以赴，而且後方支援也是全民動員。當時美國的製造業全部開動，投入的生產力和取得的效率大得驚人。二戰結束後，世界主要國家的軍事裝備、武裝力量的比重，以及經濟力量的強弱，徹底改變。生產制度本身出現了大規模生產的現象，完全改變了廠房設施的面貌。這種變化，不是無產者的挑戰，而是美國制度的新突破。二戰後假使沒有美國幫助西歐和日本重建，今天的世界將落後很多。美國幫助這些地方重建，阻擋了共產集團勢力的擴大。這就是美國外交戰略家凱南(George F. Kennan)曾經說的：我們要把他們圈在他們自己的範圍之內，停止與他們的交往，不允許紅色力量侵入世界各處。這一場無硝煙戰爭，其規模之大，幾乎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。如果沒有核彈爆炸的菌狀雲陰影的話，恐怕第三次世界大戰早就打起來了。核彈的威力，從廣島和長崎來看，使得每個擁有核彈的國家非常躊躇，他們必須認真考慮是否使用

核彈進行戰爭，因為一旦使用，敵對的雙方必將同歸於盡，人類也將在地球上消失。

## 二 目前形勢的分析與忠告

以上所講的是內在勢力和外在勢力挑戰霸權的情況，現在談目前的世界形勢。當前美國對中國的敵視，由來已久。美國繼承了歐洲對中國的淺見和誤解，轉而產生了對中國的懼怕。中國在紅色陣營中，沒有像前蘇聯和東歐國家那樣解體。列寧和斯大林時代的共產制度和獨裁的強權政治在普京(Vladimir V. Putin)時代大大改變。中國與俄國不一樣，保留了「中國式的共黨政權」。中國拜賜於鄧小平，他的南巡講話，規劃改弦更張的政策，向新的方向發展。否則，中國將又陷入文化大革命時期霸權之下錯誤的泥潭中。

鄧小平理性地改變了他的前任極其瘋狂的治國方向。這是個改變的過程，過程不是終點，以後還會有改變。至於將來會怎樣，我們拭目以觀。我們目前無法斷言，主觀的希望和客觀的現實是兩個不同的事情。旁觀者有主觀的偏好，當事者更是有其自己的想法，我們沒有能力影響當權者。將來的走向如何，仍有很大的變數。換了任何一位領導者，都可能影響整個走向。

歷史本身是動盪的，有變卦。剝極則復，貞下起元，是否另開新天？這些都將是中國內在的改變，影響則及於全世界。將來中國走甚麼方向，很難判定。我們只能希望中國人的子孫生活一步步改善，國泰民安。我們海外華人沒有權利干涉中國本身的政治制度；我們看待中國，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；喜懼之間要看個人的心情，關懷的程度是有差別的。我們只能祝福中國在穩定的環境中發展和建設，並注意兩點：第一，寧可韜光養晦，不要對外輕舉妄動。第二，寧可穩扎穩打，不要好高騖遠地冒進，不要把力量浪費在大型的難有回報的計劃上，因為本錢有限。另外，我們也了解國家處境的艱苦。中國沒有要挑戰美國霸權的意思，以過去的歷史來看，霸權的主體對新興的力量，無不持有仇視態度，希望美國的有識之士能夠理解：在地球上，中、美可以共容，不必相抗。這是我們在海外的華人的一個願望。

假如霸權在所難免，中國也應該考慮是否可以分擔責任。如果世界的情況，如《易經》中「用九，見群龍無首，吉」，群龍漫天自由飛翔，沒有領頭，這是最理想的狀況。非要有領頭的話，最好安排幾個龍頭分區治理：歐洲一個區，美洲和南太平洋一個區，東亞一個區。這三個大區域的龍頭，基本上可以照顧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，並且共同商討世界大事。中國做一個領頭，專門照顧東亞和太平洋，比照顧全部要好。這樣可以責任分擔，義務也要分擔。要知道，權力方面，愈是登得高，心裏愈是擔心。高位的國家要多擔當，既要替別人操心，也要替自己操心。要盡量謙恭，盡量容忍；不要惹是非，不要稱霸，更不要輕易發動戰爭。中國在東亞，一向是第一大國；中國

作為宗主國的地位領導東亞已經有幾千年了。好的王朝、明智的皇帝對周邊的鄰居採取的都是睦鄰政策，遠交近來，交好遠邦，放近鄰進來，各國可以和平相處。要照顧國際的局面，這是要件之一。不能為了撐面子，強做老大。美國的失誤，就是因為強做老大數十年，打了無數次對美國毫無意義的戰爭。國家負擔了巨額軍費，喪失人命，帶來了極大的損失。由一個國家擔負全部責任是擔不起的，強撐到最後一定會垮台。所以，與其垮台，不如穩扎穩打。以上是我個人對中國的一個勸告。

另一個勸告是關於國內建設方面的。由於中國和世界是不可分的，世界的合比分要好得多。特朗普 (Donald J. Trump) 欲將世界回到收縮的情況，是不可能的。既要當龍頭，又要縮手，不可得也。各國有各國的特點，發展的過程也都不一樣，要考慮到每個國家本身的背景，再做必要的干預。只有在一個國家涉及或損害到國際利益的時候，霸主才應該介入；否則，不要輕易介入他人的事務。世界的和平之道，在於如何在各種不同的形相之間、不同的制度之間，求取最大的共存，最大的公約數。中國要在世界局面中求不敗之地，對國內的事情追求安定之外，使得老百姓豐衣足食的同時，也不要因為國家膨脹太快而不知所措。膨脹包括許多方面，比如過份的建設、過份的外債，都是問題。經濟上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，債務是可以原諒的，因為債務就是貨幣在流通，但債務到了一定程度時，會承受不住。中國前途無量，我們切記百花齊放是美的，而一枝獨秀則不可取。一個鳥語花香的世界，是許多種的花草、許多種的樹木，都各安其事地綻放笑容笑臉。不要走同樣的發展路線，自己盡量求彈性，避免固執。如前面所說，「見群龍無首，吉」。美國不必擔憂退場後的冷落，中國也不需盼望登台時的喝采。不擔任霸主，有事大家商量，又何必坐上霸主之位，替人家操勞？

這是我作為一個九十歲在美國生活的老年人對當局者的諫言。我們生活在海外的華僑，只盼望桑梓故國一切安好。對國內的事務、國內的制度，我們沒有權利介入，沒有權利干涉，但這關係到老百姓的生活、國家的前途和國家的安定，我由衷地提出這一忠告，盡其心而已。

在《二十一世紀》三十周年的紀念日，我寫這篇文章，感慨萬千。《二十一世紀》成立的時候，是中國極度動盪的時候；二十周年的時候，我是在香港過的，有榮幸向港、台、大陸俊賢請教。那一次，也與李慎之先生談話；承蒙他暢所欲言，有對過去的檢討，也有對未來的期盼。我們徹夜長談，從半夜一直談到將近天亮；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記得在賓館房間裏的談話內容。在《二十一世紀》三十周年慶，一個九十歲老人回憶過去種種，展望未來種種，心情五味雜陳：港中氣氛，今日不知如何以為慶，何以為弔？但願上天，為中國人民安排美好的未來，平安地過日子。